



Discipline and Carnival: An Analysis of Algorithmic Ethics in Linguistic Governance within Cyberspace

CAO Jin LI Xin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Received: January 28, 2026

Accepted: February 27, 2026

Published: June 30, 2026

To cite this article: CAO Jin & LI Xin. (2026). Discipline and Carnival: An Analysis of Algorithmic Ethics in Linguistic Governance within Cyberspace.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6(2), 182–195, DOI: 10.53789/j.1653–0465.2026.0602.019.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6.0602.019>.

The research is supported by the 2024 ministerial-level general project under the National Language Commission's "14th Five-Year" Research Plan, titled "Research on Cyberspace Language Governance in the Context of Gen-AI Development" (Project No. : YB145–126).

Abstract: In the era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lgorithmic ethics has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concern in cyberspace language governance. This paper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logic of uniformity” in algorithms, which is oriented towards efficiency and controllability, and the “inherent plurality and complexity” rooted in the socio-cultural nature of language. Employing Michel Foucault’s theory of “discipline” and Mikhail Bakhtin’s theory of “carnival” as its theoretical foundation,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dialectical analytical framework. Through in-depth case studies of three representative Chinese internet neologisms, “Person in charge”, “Breathtaking” and “Love yourself”, the research reveals a dynamic, symbiotic, and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cipline” and “carnival.” Ultimately, the study proposes “carnival compatibility” as a novel framework for online language governance. It advocates for the intentional preservation of flexible spaces within algorithmic design and platform governance to accommodate unpredictable and creative user linguistic practices. This approach seeks a balance between order and vibrancy, offering a theoretical pathway for building a more inclusive and culturally dynamic digital language ecosystem.

Keywords: Algorithmic ethics; discipline (Foucault); carnival (Bakhtin); cyberspace language governance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s: CAO Jin holds a Ph. D. degree. He is a Second-Class Professor at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His major interest lies in Internet Language, Language and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Emergency Language Services. His email address is 136160999@qq.com. LI Xin is an MTI student at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His major interest lies in culture translation. His email address is 2275759307@qq.com.



規訓與狂歡： 網絡空間語言治理中的算法倫理探析

曹 進 李 鑫

西北師範大學

摘 要: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時代,算法倫理是網絡空間語言治理中不可忽視的問題。本文旨在探究以效率與可控為導向的算法『單一性邏輯』,與源自語言社會文化本體的『多元複雜性』之間的衝突。研究基於福柯的『規訓』理論與巴赫金的『狂歡』理論,構建了一個辯證的分析框架。通過對『主理人』『絕絕子』『愛你老己』三個典型案例的深入剖析,本研究揭示了『規訓』與『狂歡』之間動態的共生與辯證關係。最終,研究提出『狂歡兼容性』作為一種新興的網絡語言治理框架,主張在算法設計與平臺治理中,為不可預測的、創造性的用戶語言實踐預留彈性空間,從而在秩序與活力之間尋求平衡,為構建更具包容性與文化生命力的數字語言生態提供理論路徑。

關鍵詞:算法倫理;規訓;狂歡;網絡空間語言治理

基金項目:國家語委『十四五』科研規劃 2024 年度部級一般項目『生成式人工智能發展背景下網絡空間語言治理研究』(項目編號:YB145-126)。

一、引言

(一) 研究背景

當下智能化社會中,算法與計算機科學、人工智能密切相關,它不僅是客觀的程序、代碼,更超越了純粹技術,走向了社會技術網絡的集合方向^②。生成式人工智能(Gen-AI)的迅猛發展,標誌著算法對網絡語言生產的介入從『篩選與分發』邁向了『直接生成與塑造』的新階段。邁克·安妮^①在其研究中指出,算法指那些『由規定的計算機編碼、人類實踐和規範邏輯等三者構成的物的集合』。周媛媛^③認為,大語言模型(LLM)的廣泛應用使得語言結構同質化與標準化,個體情緒表達出現模板化,表達風格也缺乏多樣化。因此,算法對標準化文本的偏好與網絡語言戲仿、變異的天然屬性形成對抗,直接引發語言表達同質化與創造力流失的雙重困境。以大型語言模型為核心的智能工具,通過預測概率生成流暢文本,在提升信息生產效率的同時,也內置了一種追求標準化、可識別與可預測的『單一性邏輯』。王羽涵等^④研究發現,人工智能在處理語義潛隱性高的語言結構時,常出現語義流失、語用偏差與文化誤讀等問題,其生成文本的穩定性與語義一致性缺乏保障。由此可見,算法對語言的處理仍存在諸多問題,因此會引起算法偏見等諸多倫理問題。同時,網絡語言在使用和傳播的過程中,頻頻產生網絡謠言、語言暴力、隱私泄露、網絡欺凌、惡意傳播、網絡失語、網絡侵權、標題黨等問題,因為具有開放性和自由性的網絡環境中主體多重角色、信息海量、匿名性等特征,規範網絡主體行為的網絡語言倫理的建構尤為必要^⑤。這種邏輯與人類語言社會文化固有的雜語性、動態性與創造性本質產生了深刻衝突。此外,在虛擬空間中,巴赫金^⑦認為的『狂歡廣場』,充斥著戲仿、混梗、意



義增值與創新,全民參與的談諧文化打破社會等級,顛覆權威話語,構建平等對話;然而,算法權力的深度嵌入,使其日益呈現出米歇爾·福柯²⁹所揭示的『規訓』特征,即通過對流量的分配、對模板的推崇、對『安全』內容的偏好,社會規約無形中規訓著語言的表達形式與意義邊界。肖莎娜·祖博夫在規訓理論的基礎上發展出監控資本主義——通過大規模收集和分析用戶行為數據,生產預測產品並交易,以實現資本積累的新型資本主義形態³⁰。然而,當前研究多聚焦於技術倫理,或偏重於文化分析,缺乏將算法視作一種新型權力技術。因此,本研究正是置於『規訓』與『狂歡』的理論視角下,對網絡空間語言治理進行動態、辯證考察的深入探索。

(二) 研究目的與意義

本研究旨在深入剖析 Gen-AI 時代,算法邏輯與用戶實踐共同塑造網絡空間語言時所形成的倫理困境。本研究目的有以下三點:第一,係統整合福柯的『規訓理論』與巴赫金的『狂歡理論』,構建一個用於分析網絡空間語言下算法倫理的『規訓—狂歡』辯證分析框架。第二,通過選取『主理人』『絕絕子』與『愛你老己』三個典型案例,微觀解析算法如何具體實施『規訓』以生產單一性,以及用戶如何通過創造性、戲仿性的『狂歡』實踐進行挪用、抵抗或再創造,揭示兩者互動博弈的複雜機制。第三,基於數據分析,突破網絡語言的二元對立,初步探析一種具有『狂歡兼容性』的數字語言治理倫理方向,為構建既包容創新又負責任的網絡語言生態提供學理思考。

此外,本研究也具有網絡空間語言治理層面意義。在理論層面,基於傳播學、語言學與社會理論,將福柯的規訓理論與巴赫金的狂歡理論相結合,為理解人機協同時代的語言倫理提供了新穎的分析框架。在現實層面,研究智能算法社會的內容治理困境,其結論有助於平臺設計者及廣大網民更清醒地認知算法對語言文化的塑造力與局限性,從而在技術設計、規則制定與個體實踐層面,共同尋求維護語言多樣性與社會表達活力的可行路徑。

二、理論框架

(一) 福柯的規訓理論

福柯所界定的『規訓』,是一種誕生於 17、18 世紀,旨在通過精密技術塑造『馴順且有用』的個體的權力機制。它標誌著權力運作從君主時代公開、殘酷的肉體懲罰,轉向隱蔽、連續且作用於日常生活的控制³¹。其核心運作依賴於三種技術:層級監視,即以全景敞視監獄為理想模型,通過不對稱的凝視制造持續的可見性;規範化裁決,即通過一整套微觀處罰規範,不斷比較、區分和矯正個體行為,使其趨近於既定標準;檢查,即將監視與裁決結合,通過檔案化將個體固定為可描述、可比較的『案例』³²。張一兵在研究中發現,福柯話語中的權力關注『細節』,是一種『有關細節的政治解剖學』³³。規訓權力因而是一種與知識生產共生的『權力—知識』裝置,它不同於宏觀的國家主權或法律權力,而是滲透於社會肌體的最細微處,如學校、工廠、醫院乃至家庭。在此過程中,規訓權力與知識生產緊密結合,形成『權力—知識』共生體。關於人的科學(如心理學、教育學、犯罪學)不僅為規訓提供合法性論證和技術支持,其本身也正是在各種規訓機構(如診所、教室、監獄)的實踐中得以形成和發展的。因此,規訓既是一種權力技術,也是一種認知程序³⁴。後續有研究者指出,規訓權力在當代呈現出『隱蔽化』與『溫和化』的趨勢³⁵。權力不再僅靠強制,而是與消費主義、自我優化等話語結合,誘導個體主動進行『自我規訓』。這一脈絡的研究深化了對現代社會主體如何被塑造的理解,強調了規訓的內化與主體性生產的複雜過程。隨著數字技術的全面滲透,規訓理論迎來了至關重要的

『數字轉向』。學者們普遍認為,算法、大數據和平臺架構構成了數字時代的核心規訓裝置^⑩。

規訓將目標當作能動的主體,但不同於『影響』對主體行動的塑造,規訓塑造了主體的身份與主體性本身。由於規訓對象對外部要求的內化需要較長時間,因此以規訓為機制的制度化過程較為漫長,但制度化的結果相對穩定^⑪。因此,在數字時代,各個平臺通過數據抓取與行為分析,實現了前所未有的持續性層級監視。

對於網絡語言的算法規訓研究,近些年學者們從以下幾個層面展開:第一,語言的『數據化』與『可見性』規訓。胡凌^⑫研究指出,平臺通過持續的層級監視,如記錄點擊、停留、轉發,以及自動化檢查,如內容審核、用戶畫像,構建了數字全景敞視主義。語言的可見性與傳播範圍不再取決於其內在價值或社會共識,而取決於其是否符合算法的數據化評價體系,從而實現對表達空間的隱性規劃^⑬。第二,表達的『標準化』與『規範化』裁決。它隱性地定義何種語言風格,如簡短、情緒化、帶有特定標籤,何種話題傾向更易獲得獎勵(曝光),從而引道用戶主動調整表達,以適配平臺的『推薦規範』。這道致網絡語言生產出現『模板化』定制或『模因化』複製傾向,高度概括的情緒標籤被算法青睞並推廣,擠壓了複雜表達的生存空間,形成追求『單一性邏輯』的語用環境。第三,個性化的『微型制裁』與主體塑造。個體在技術提供的馴化便利性與潛在操控性之間持續擺動,在被精準認知與受隱性支配的交互中,逐漸模糊了信息甄別與價值自主的邊界。倘若技術裝置演化為權力的物質化延伸,算法機制轉變為新型社會規訓手段,那麼個體自主性的重構,必然須建立在對技術理性的批判自覺與制度性信任的協同基礎之上。通過用戶畫像,算法能對不同個體實施差異化的『微型制裁』——對不符合其偏好或平臺規則的內容進行限流、屏蔽或標籤化。

因此,『福柯筆下的規訓社會在數字時代演變為算法規訓,這種認知標準化使剝削深入到思維方式層面,形成福柯意義上的自我技術,勞動者主動以資本設定的認知框架規訓自身,完成剝削的自我實施』^⑭。綜上所述,福柯的規訓理論經歷了從經典闡釋到社會泛化,如今在數字時代通過『算法規訓』這一概念煥發新生的理論旅程。算法通過對網絡語言的數據化轉譯、流量化裁決與個性化塑造,實施著一種比傳統機構規訓更為隱蔽、高效且廣泛的治理。

(二) 巴赫金的狂歡理論

巴赫金在對歐洲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的狂歡節現象的研究中提出『狂歡化』理論,他認為該理論的核心主要表現為題材與場景的狂歡化、人物形象的狂歡化、語言與文體的狂歡化、情節結構的狂歡化、脫冕結構等形式^⑮。該理論描繪了一個暫時顛覆社會等級秩序、崇尚自由對話的『第二種生活』的生活。這一理論包含幾個關鍵維度:全民參與性、等級消弭與平等對話、對官方語言的戲仿與降格,以及一種『既肯定又否定,既埋葬又再生』的談諧世界觀^⑯。

後續相關研究中,國內學者便敏銳指出,網絡空間的去中心化、匿名性與互動性,與巴赫金筆下的『狂歡廣場』存在深刻契合,為大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自我表達與情緒宣泄渠道。這構成了將狂歡理論引入中國網絡文化研究的起點。『美國大眾文化理論家約翰·菲斯克創造性地運用了巴赫金的狂歡理論分析了美式摔跤比賽中身體的狂歡及其隱含的各種權力關係和政治力量。』^⑰胡春陽初步探析了狂歡理論在網絡研究中的應用,並指出『目前網絡研究方面存在的薄弱環節就是網絡與人類生活本質的聯繫,進而言之,就是網絡給人提供的是何種自由及其可能性^⑱』。進入數字時代,巴赫金的狂歡理論獲得了新的闡釋,網絡空間,尤其是社交媒體平臺、彈幕視頻網站和模因文化盛行之地,在相當程度上具備了『亞文化狂歡廣場』的特征。汪振和軍常欽指出,網民通過仿擬、拼貼創造流行語體,如『凡客體』『甄嬛體』等,是一場『顛覆傳統、標新立異』的盛大全民狂歡^⑲。這種行為不僅是娛樂,更深層地反映了社會轉型期公眾的『權利焦慮』與對嚴肅話語的疏離與諷刺。研究視野隨後擴展到非文本領域。網絡表情包和自定義符號的流行,因其對經典形象的解



構與再創造,以及其在公共事件討論中的情緒動員作用,被視作數字時代的『狂歡節語言』。而網絡直播則構建了更極致的狂歡場景:主播通過表演獲得『加冕』,觀眾通過打賞、彈幕參與儀式,共同在虛擬廣場中建構臨時性的平等關係與情感共同體^③。燕道成和談闊霖^④從大眾文化視角切入,研究得出『網紅經濟文化的健康發展需要堅守狂歡文化的內核,即『追求個體的生命自由,倡導個性解放』,秉持網紅經濟的文化意義和人文價值。』近期,張妮娜和周藝^⑤培通過研究發現,『共享文檔的『在線野聊』既昭示著社交本質的回歸和對平等對話的期待,也被寄予著人們自我解壓與情感宣泄的電子烏托邦想象。』此類研究揭示了狂歡形式從文本向多模態、從異步向實時互動的發展。

巴赫金的狂歡理論經歷了從理論引介與現象印證,到深入剖析各類數字實踐,最終轉向批判性審視其與技術權力共謀關係的複雜過程。當下的研究共識在於,網絡語言的『狂歡』與算法的『規訓』並非簡單對立,而是陷入一種深刻的辯證關係:用戶以狂歡策略尋求表達自由與身份認同,而算法架構則通過流量分配、個性化推薦和商業邏輯,持續地對這種狂歡進行引導、規訓與收編。網絡語言的狂歡實踐並非孤立存在,其與算法規訓形成的動態關係,構成了網絡語言生態的核心張力。

(三)『規訓—狂歡』的共生與辯證關係

『規訓—狂歡』的對立與共生關係暗藏於在算法權力與用戶實踐的語言場域中。然而,只有回到 Gen-AI 技術內核才能深入理解當前算法規訓的底層邏輯。目前,在以 Transformer 架構為基礎的大語言模型中,概率模型作為其核心生成機制,基於海量語料進行概率預測,即逐詞計算並選擇『最可能』出現的下一個語言單元。而 RLHF(人類反饋強化學習)作為大語言模型的上層優化技術,雖旨在通過人類偏好反饋優化模型輸出,卻在客觀上形成對語言表達的標準化引導。方小兵發現,數智時代的語言安全的核心矛盾突出表現在技術創新的『開放性』與語言資源『防護性』、全球算法的『同質化』與語言文化『多樣性』之間的深刻張力^⑥。上述現象表明,大語言模型的底層邏輯傾向於語言的單一性與平庸化,這與巴赫金的狂歡式語言創造力形成了根本性的技術張力,也構成了本文所分析的算法規訓的微觀技術基礎。

近年來,研究的重心發生了關鍵性轉移。學者們不再將網絡空間單純視為自由的『狂歡淨土』,而是日益關注到平臺算法作為一種新型權力機制,對狂歡實踐進行的引導、收編與規訓。福柯的『規訓』理論與巴赫金的『狂歡』理論,分別揭示了社會權力運作的一體兩面:前者,福柯筆下的規訓社會在數字時代獲得新形態,算法通過壓縮不確定性,將時間管理轉化為技術編碼,使個體在追求效率的過程中不自覺地接受算法的規訓,產生算法路徑依賴^⑦。後者則聚焦於民間力量如何通過顛覆性的儀式與話語實踐,短暫地打破這種秩序,釋放多元與異質的聲音。將這兩種看似對立的理論並置,並非簡單的理論拼貼,而是基於它們對『權力—抵抗』動態關係的共同關切,為剖析 Gen-AI 與算法深度介入下的網絡語言生產,提供了一個極具洞察力與張力的辯證分析框架。

首先,算法作為一種新型的、智能化的『權力技術』,其運作邏輯與福柯筆下的規訓機制深刻同構。算法通過持續的數據化『監視』、基於流量與合規的『規範化裁決』以及用戶畫像的『檢查』儀式,構築了一個數字圍牆。有研究指出,算法推薦係統基於流量效率的邏輯,悄然執行著『規範化裁決』。它通過獎勵某些易傳播、高互動的語言模式,無形中塑造著『何為受歡迎內容』的標準^⑧。其根本目的在於塑造可預測、可管理、符合平臺利益與主流價值的網絡言行,本質上是追求一種高效但『單一性的邏輯』。

與之相對,網絡用戶的語言實踐,特別是網絡流行語的創造、傳播與變異過程,則充滿了巴赫金所描述的『狂歡』色彩。網民通過戲仿、拼貼、誇張、降格等手法,對主流話語、社會現象乃至算法本身進行解構與再創造,如『網絡造句』運動所展現的,這是一場『顛覆傳統、標新立異』的盛大狂歡,其內核是追求表達的『多元複雜性』。因此,『規訓』理論精準地解釋了算法作為結構性力量對語言生態的『塑形』作用,而『狂歡』理論

則有力地闡釋了用戶作為能動主體對這套體系的『應變』與『再造』。

其次,二者並非簡單的二元對抗,而是處於一種動態的、螺旋式的『共生與辯證』關係之中。這種關係主要體現在『對抗與顛覆』『收編與馴化』『共生與共演』三個層層遞進的層面。狂歡作為對規訓的戰術性抵抗,在算法設定的單一性話語秩序中,用戶的狂歡式實踐首先表現為一種抵抗。規訓對狂歡的戰略性吸納,算法的權力是敏銳且靈活的,它並非一味壓制狂歡,而是常常迅速識別、學習並試圖『收編』那些具有高傳播能量的狂歡產物。共生與共演中永不停歇的辯證螺旋,正是抵抗與收編的持續互動,構成了網絡語言生態的動態核心。

換言之,『規訓—狂歡』框架超越了靜態的結構決定論或浪漫的主體抵抗論。在分析網絡空間語言案例時,必須同時審視以下三個問題:第一,算法如何試圖規訓這些話語的意義與使用邊界?第二,用戶又如何通過創造性、戲仿性的使用對其進行狂歡式顛倒?第三,這種拉鋸戰如何塑造了該詞匯的語義流變與社會影響?這一辯證視角,為深入理解算法時代語言治理的複雜性,以及探尋一種能夠包容創造性狂歡的治理倫理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三、『規訓—狂歡』案例分析

本研究旨在通過對特定網絡流行用語進行實證分析,以探討算法邏輯與用戶實踐之間的互動關係。在案例選擇上,聚焦於 2025 年度具有代表性的三個網絡熱詞:『主理人』『絕絕子』與『愛你老已』。這三個詞匯分別來源於消費文化、情緒表達與語音誤聽,其生成與傳播機制各異,能夠較為全面地反映網絡語言生態的多元面貌。

為量化分析上述詞條在網絡空間的傳播熱度與軌跡,本研究採用多平臺、跨媒介的詞頻統計與趨勢分析方法。具體而言,研究選取了在中國互聯網生態中占據主導地位、且代表不同社交場景與內容形態的三個核心平臺作為數據源:

百度指數(2025.10.20—2026.01.20):主要追蹤詞匯在搜索引擎及新聞資訊領域的公眾關注度與議題熱度,反映其作為公共話題的傳播廣度。

微信指數(2025.01.24—2026.01.23):綜合考察詞匯在微信生態(包括公眾號文章、視頻號內容、朋友圈互動及廣告投放等)內的滲透率與討論度,反映其在強社交關係鏈和私域內容場域中的流行情況。

微博指數(2025.10.23—2026.01.07):重點監測詞匯在新浪微博這一開放式廣場式社交媒體中的熱議程度與趨勢變化,捕捉其作為公共討論素材的實時動態與爆發力。

數據采集的時間窗口設定分別為:百度指數(2025.10.20—2026.01.20),微信指數(2025.01.24—2026.01.23),微博指數(2025.10.23—2026.01.07)。通過對這三組來自不同維度的指數數據進行橫向對比與時間序列分析,本研究試圖勾勒出目標詞匯在不同算法邏輯與用戶群體作用下的差異化傳播圖景,為後續的理論分析提供實證基礎。

(一) 案例一:主理人

胡明鑫^①指出,在算法知識內容生成中已出現明顯的同質化與內卷化問題。『「主理人」一詞最初源於 20 世紀末至 21 世紀初的亞文化領域,尤其活躍於潮牌服飾、地下音樂(如說唱、街舞)等小眾圈層。這些領域的品牌或活動往往由核心成員主導運營,他們既是創意輸出者,也是實際管理者,由此逐漸形成了「主理人」這一非正式稱謂^②。』其演變軌跡清晰呈現了從專業術語的語義泛化,到被算法選擇性強化為特定語用標籤,最終在用戶廣泛的創造性使用中解構與再語義化的過程,充分體現了語言在社會動力作用下的動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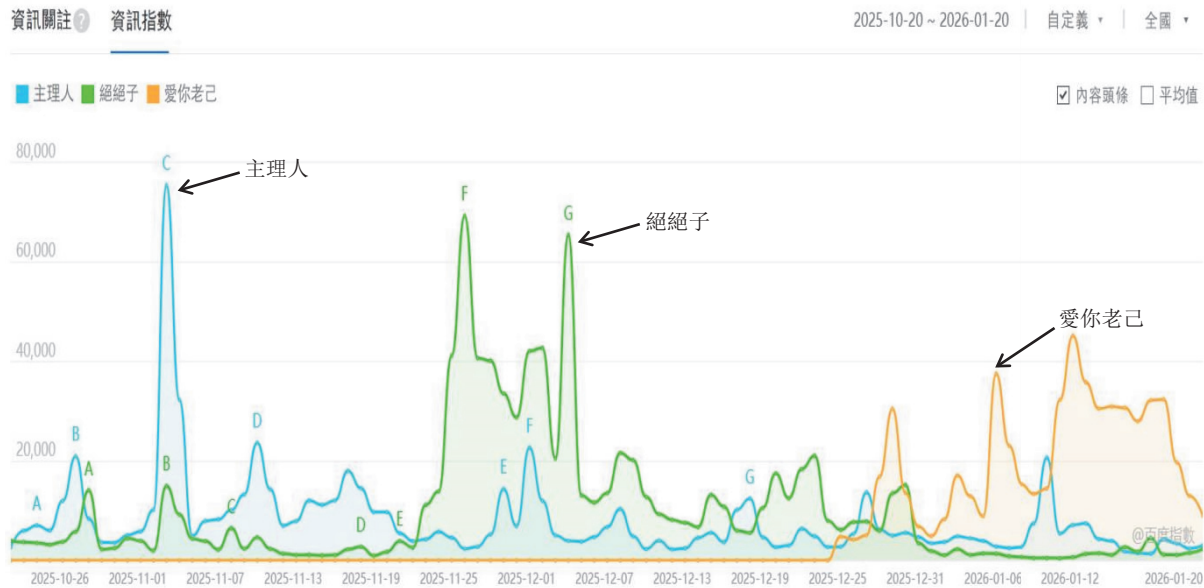


圖 1 『百度指數』關注度趨勢

指數趨勢 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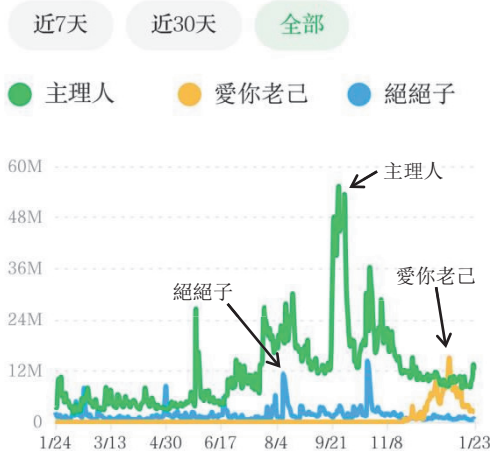


圖 2 『微信指數』關注度趨勢

指數趨勢



圖 3 『微博指數』關注度趨勢

本質，為觀察算法邏輯與用戶能動性如何在網絡語言場域中博弈提供了典型樣本。

首先，從微信指數來看，『主理人』近一年資訊關注度峰值達 56000000+，印證了算法流量強化對其傳播的助推作用，而後續熱度快速下滑則反映用戶狂歡式反諷對其語義空洞化的加速。『主理人』的詞匯演化經歷了從法律、商業等領域的專業指稱，到日常語用的語義下沉與內涵拓寬。根據社會語言學的語義泛化理論，當一個專業詞匯進入大眾視野，其外延會擴大，內涵則可能發生磨損或轉移。『主理人』原指機構或項目的『主要負責人』，帶有正式與權責色彩。進入消費文化領域後，其語義重心從『負責』轉向『主導理念與風格』，附著了個性化、審美化與去機構化的新內涵，成為一個象征文化資本與生活方式的身份符號。這是語言自然流變的必然結果。其次，算法介入加速並規約了這一流變的方向，形成了選擇性的規訓機制。內容

平臺的算法並非創造語義,而是通過識別與『主理人』標籤相關聯的高互動內容,對其進行流量加權和規模化推薦。這導致符合算法偏好的『主理人』話語被無限複製與放大,而其他語義側面則被邊緣化。算法在無形中執行了福柯所說的『規範化裁決』,定義並固化了一套關於『何謂成功主理人』的標準化語用範式與話語模板,試圖將多元的個人表達收編為可預測、可歸類的數據流,體現了追求效率的單一性邏輯。最後,網絡用戶通過創造性的語用實踐,以狂歡式解構打破這一符號的固化認知,展現了語言的多元複雜性。用戶以語言學上的『戲仿』『降格』與『語義通貨膨脹』為主要策略,例如,通過生成『咖啡主理人(不理人)』『工位主理人』等反諷性表達式,用戶將原詞從高雅語境降格至日常甚至滑稽場景,消解其附著的文化優越感。這種全民參與的語用狂歡,實質是巴赫金所描述的廣場語言的現代體現,它打破語用等級,通過雜語喧嘩顛覆單一權威闡釋。用戶的實踐並未消滅該詞,而是強行拓寬了其語用邊界,注入了批判、戲謔的新語義層,實現了對算法規訓的語用抵抗與意義再生產。

此案例表明,『算法驅動的空間重構可能固化權力規訓,導致身體在空間中的『位置性剝奪』^⑨。算法通過流量分配規訓語言的傳播路徑與顯性語義,而用戶則通過微觀的語用創新爭奪意義的最終解釋權。『主理人』的語義博弈,印證了規訓與狂歡的動態共生,算法的單一性邏輯與用戶的多元創造形成持續張力,網絡語言治理需正視這種張力,在算法設計中為無法預測的、創造性的語用狂歡保留必要空間,以維護語言生態的活力。

(二) 案例二:絕絕子

從百度指數來看,『絕絕子』屬於 2025 上半年的熱點資訊,關注度峰值達 70000+,下半年後熱度下降,印證了算法規訓與用戶狂歡式對其的雙重影響。劉寧^⑩指出,『「絕絕子」最初流行於網絡粉絲社群,作為表達偶像崇拜的新型語言符號,其借助「子」字後綴形成的萌化表達,成功塑造了有網絡世代特征的誇贊範式。』『絕絕子』的興起與流變,是觀察算法時代下語言模因如何被快速生產、規訓,並在過度使用中引發意義內爆的典型語言學案例。這個詞語的生命周期,清晰展現了語言的能指與所指在流量邏輯中如何脫節,以及用戶如何通過語用實踐對空洞化符號進行抵抗與再詮釋。

從語言學構成來看,『絕絕子』是一個具有強情感色彩但弱語義內容的『評價性語綴』。『其結構「xx 子」利用重疊主要來強化語用表達,具體表現兩種含義:主體對所指對象的態度以及主體自身的親切可愛^⑪。』通過重疊與後綴化,極大強化了主觀感嘆語氣,卻抽空了『絕』字原本所依賴的具體評價對象與比較基準。它成為一個高度依賴語境、主要用於宣泄情緒的語用標記,這種模糊性既是其初期得以廣泛適配不同場景、實現病毒式傳播的優勢,也為其後的語義空洞化與用戶反噬埋下了伏筆。

算法的規訓體現在對其進行的去語境化封裝與模板化推廣。平臺算法迅速捕捉到這一高互動性語言模因,並將其識別為一個穩定的正面情感標籤。算法通過兩種方式對其進行規訓:一是流量強化,凡標題或標籤中含『絕絕子』的內容更容易獲得推薦,這促使創作者將其作為『流量口令』高頻使用,加速了其語用範圍的無限泛化;二是語境剝離,算法將其從具體、鮮活的個人化評價中抽離,固化為一個表征『通用好評』的孤立符號,導致其語義迅速磨損,最終退化為一個近乎無意義的、僅表示『我在此處表達了情緒』的語用空殼。這體現了算法對語言多樣性的簡化與壓平。

用戶的狂歡化實踐則是對這種語用疲勞和意義空殼的創造性反叛,主要體現在反諷性挪用與意義再生產。當『絕絕子』因泛濫而失去真誠表達力後,用戶開始對其進行巴赫金式的降格戲仿。



狂歡化策略	方式	實例
極端化搭配	將其用於明顯平庸或負面的事物,通過語用悖反制造反諷效果;	你這蛋糕做的真是絕絕子啊!
形式化戲仿	模仿其構詞法創造衍生變體,解構原詞嚴肅性;	『無語子』『離譜子』
元語言嘲諷	直接討論元詞語的濫用現象本身	『描述醉人景色,是「絕絕子」;遇到巧奪天工的工藝品,也是「絕絕子」;誇夥伴才思敏捷,還是「絕絕子」…… ^⑩ 』

表 1 『××子』的狂歡化網絡用語處理

這些實踐並非為了複活詞匯,而是通過摧毀一個被算法用爛的符號,來嘲弄算法所驅動的單一、浮誇的表達生態,並在此過程中彰顯自身的話語自主性與語用創造力。

此案例揭示了算法驅動下語言模因的加速生命週期,算法通過標準化推廣催熟並榨乾了詞語的語用價值,而用戶則通過反諷性狂歡加速其死亡,並轉向創造新的符號。『絕絕子』的模因化複製是算法對詞匯的單一性規訓的結果,但同時也反映了網絡語言的狂歡化『戲仿』對詞匯的空殼式催生。這一辯證過程要求網絡語言治理意識到,算法的『效率邏輯』與語言的『活力邏輯』存在根本衝突。維護語言生態健康,不能僅靠管理個別詞匯,而需反思算法推薦機制是否在系統性地鼓勵語言的快餐化與空心化。用戶對網絡語言的『狂歡』式再創造,不僅是一種文化行為,更深植於人類的認知機制。如具身認知研究所指出的,個體基於身體經驗的差異會導致對同一符號的理解產生必然的分歧與模糊性^②,這為突破算法『規訓』下的單一解讀、進行多元的變異化創作提供了根本的認知可能性。

(三) 案例三:愛你老己

『愛你老己』,是英文『Love yourself』的中文表達。這一網絡流行語的誕生與傳播,為網絡用戶提供了一個超越簡單諧音梗分析的、極具深度的語言學與社會學觀察樣本。從微博指數來看,『愛你老己』是 2025 年末的熱詞,關注度峰值達 900000+,途中連續出現高峰和低峰,說明新的熱點資訊正在經歷用戶狂歡式的戲仿和算法單一性的規訓。其不僅體現了語言在口頭傳播中的自然變異,更生動展現了在社交媒體與算法介入下,一次偶然的語音『誤聽』如何被用戶集體征用、演繹,最終升格為一場關於親密關係、地域文化乃至自我身份的大型話語實踐。其過程深刻地揭示了算法邏輯與民間語言智慧之間複雜的共生與博弈。

從詞匯淵源看,『愛你老己』根植於語言接觸中的『誤解』與『再詮釋』這一經典社會語言學現象。這個梗最早源於遊戲《英雄聯盟》中角色臺詞『愛你老媽,明天見』,後經玩家的創造性改變,最終稱為『愛你老己』。這一起源本身包含多重語言學要素:首先是角色身份的轉換,從『老媽』轉變為『老己』拉近了人與自身的關係;其次是語義的聯想附著,『老己』雖無傳統詞匯意義,但其音、形(與『自己』的『己』同字)迅速引發了新的意義聯想。這並非單純的錯誤,而是一個完整的『言語行為—聽覺接收—社會傳播』的語言事件,其後續發酵完全由社會互動驅動。

網絡空間中承載文化意涵的縮合型話語(如漢語塊狀語),其施事義潛隱的特性依賴語境關聯與認知 ICM 模式實現語義完整傳遞,而算法在自動化處理這類話語時,常因缺乏對深層認知機制的適配的而出現語義顯化失當、文化內涵誤讀等倫理風險,這一現象凸顯了算法倫理治理需兼顧話語認知邏輯與語境適配性的核心要求^③。算法規訓主要體現在對這一偶然語言事件進行熱點化提取與框架化推廣,試圖將其納入可控的情感表達與流量生產軌道。平臺算法通過趨勢監測,迅速識別到這一詞匯的討論熱度和互動潛力,其規訓機制隨即啟動,其一,進行話題封裝與分流,創建『#愛你老己#』統一標籤,將原本散漫、多義的討論收編進一個可索引、可溯源的數據庫條目中,便於管理和引導流量。其二,推動意義窄化與模板化。算法更傾

向於推薦那些將『愛你老己』明確解讀為『一種可愛的口音錯誤』或『另類表白梗』的內容,從而將其規訓為一個安全、溫馨、易於參與的情感表達模板,剝離其可能蘊含的更複雜的社會文化討論,如對地域口音的刻板印象、對婚姻關係的調侃等。算法在此扮演了語言管理員的角色,試圖為這場偶然的狂歡修建堤壩,引導其流向既定的、非爭議性的情感消費池塘。

然而,網絡用戶的狂歡化使用,恰恰在於衝破這種算法規訓,將『愛你老己』推向更廣闊的『意指實踐』舞臺,展現了強大的符號生產力與意義解構力。用戶的實踐遠超簡單的模仿,而是進行了一系列創造性的『語言遊戲』。

關係模式的戲仿與重構:用戶不僅用於親人,更將其泛化至朋友、寵物、甚至自己與自己對話的場景,例如,『好好愛自己』『愛你老己』。這打破了算法試圖固定的親密關係框架,使其成為一種普遍的自反性情感表述,即通過對他者稱謂的挪用來完成對自我的關照與喊話。

地域文化的書寫與展演:許多用戶,特別是帶有相關地域背景的,主動使用並調侃這一表達,將其從『他者眼中的口音笑料』轉變為『自我主導的文化標識』。這並非被動接受汙名,而是以幽默姿態完成了一次主動的身份展演和文化認同,符合巴赫金狂歡理論中降格以實現自我解放的精髓。

語言形式的無限衍生:基於『X 你老己』的句式結構,衍生出『煩你老己』『誇你老己』等無數變體。這種能產性證明,用戶關注的並非原詞本身,而是其所激活的一種高度自由、戲謔的句法模因和語用姿態。它成為一種元語言,用以嘲諷網絡流行語本身的生產機制,或用於構建圈層內部的親密感和排他性。

由此可見,對算法倫理與網絡語言治理提出了比前兩個案例更為深刻的啟示。『主理人』的翻轉體現了價值反撥,『絕絕子』的消亡展示了對抗性狂歡,而『愛你老己』的生生不息則揭示了一種更複雜的可能,即用戶能夠利用甚至『劫持』算法提供的基礎設施(如熱搜、話題),來完成一場自下而上的、意義豐富的文化創造活動。這要求網絡語言治理必須具備更高的複雜性與包容度。首先,需認識到語言的活力恰恰蘊藏在其偶然性、歧義性與用戶自主的創造性誤用之中,算法作為治理工具,不應急於對這類現象進行『一刀切』的語義規整或道德評判,而應保留一定的觀察空間,允許語言在社會互動中自然演化。其次,治理思維應從『管控具體詞匯』轉向『優化話語生態』。重點不是判斷『愛你老己』是否『正確』或『合規』,而是反思算法推薦邏輯是否過度放大衝突、簡化意義,從而壓制了像『愛你老己』衍生出的這種多元、戲謔但充滿生命力的社會對話。最終,理想的治理應致力於構建一個既能借助算法發現語言現象,又能保障用戶擁有脫離算法預設框架進行自由意義玩耍權利的彈性空間。在這種空間裏,類似『愛你老己』的語言事件,將不再僅是流量數據,而是成為我們觀察時代情緒、社會心態與文化認同的生動語料。

四、探析語言的『狂歡兼容性』倫理治理

(一) 網絡語言治理困境

在算法的倫理問題上,國外學者米特爾施泰特等通過分析數據表達的算法驅動行為造成的責任問題,認為算法的倫理問題有六個特性,即不確定性、不可理解性、誤導性、不公正性、變革性、可追溯性^⑤。在網絡語言場域中,『算法規訓』與『用戶狂歡』之間形成了根本性的治理張力。福柯式的規訓機制在網絡空間中以算法為載體,通過數據化、程序化的方式實現對語言的可見性管理。這種管理不僅體現在內容審核上,更深刻地內嵌於推薦系統的流量分配邏輯中,即算法通過識別、分類與優先級排序,將語言表達轉化為可計算、可預測、可控制的數據對象,從而構建了一套隱性的『規範化』體系。

然而,巴赫金式的狂歡力量始終在場並不斷生成新的異質性。用戶的語言變異實踐,如戲仿、拼貼、二

次創作等,構成了對算法單一性邏輯的創造性抵抗。這種抵抗並非全然對立,而是在動態互動中形成複雜的共生關係。算法試圖規訓語言,而語言狂歡則不斷溢出算法的預設框架;算法轉而學習、收編這些變異,用戶則又創造新的表達方式。這種循環構成了網絡語言生態的基本動力結構。

當前治理模式多偏向『規訓主導』,強調可預測性、安全性和秩序性。然而,過度規訓可能導致語言生態的創造性貧困,使網絡空間失去其應有的文化活力和民主潛力。因此,探尋一種能夠兼容狂歡特質的治理倫理,成為平衡語言生態多樣性與社會治理必要性的關鍵課題。

(二)『狂歡兼容性』治理框架構思

『狂歡兼容性』作為一種治理倫理框架,旨在承認並引導而非壓制網絡語言實踐中的創造性、多樣性和抵抗性。它基於以下核心認知:語言不僅是信息傳遞工具,更是文化創造力、身份表達和社會交往的基本載體。因此,語言治理不應追求絕對的控制與統一,而應致力於構建一個既有序又開放、既穩定又創新的彈性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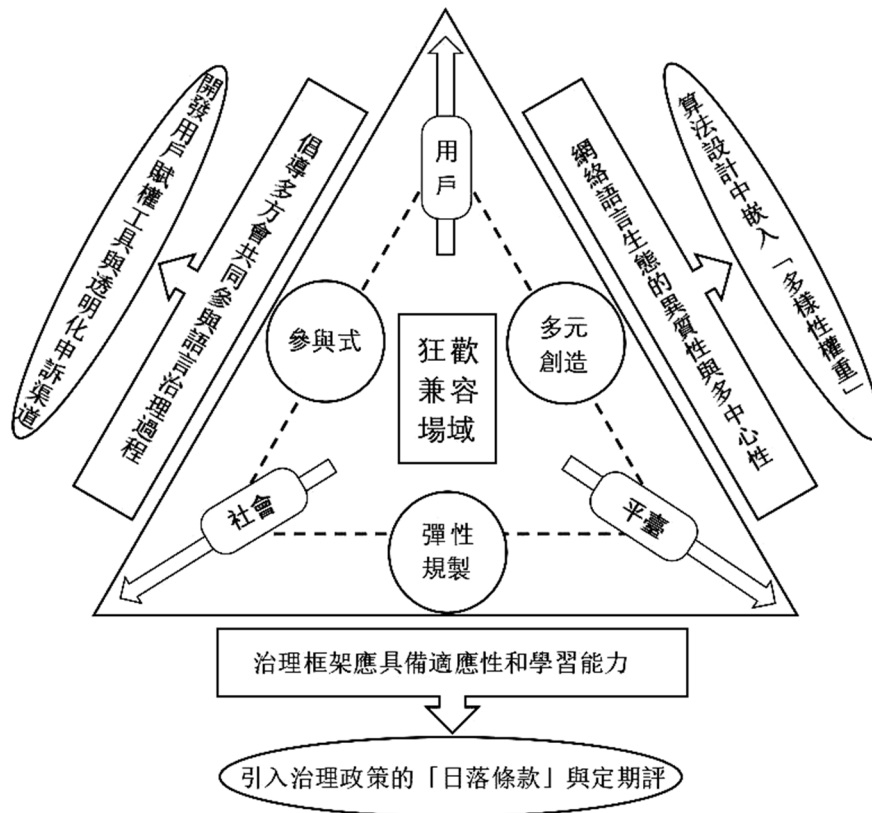


圖 4 『狂歡兼容性』三原則框架構思

由圖可見,多元性原則承認網絡語言生態的異質性與多中心性。不同於傳統媒體時代的『中心—邊緣』傳播結構,網絡語言生產具有分布式、去中心化特征。『狂歡兼容性』要求治理體系尊重不同社群、圈層的語言實踐自主性,避免將單一語言標準強加於多元文化表達,彈性規制原則強調治理框架應具備適應性和學習能力。面對快速演變的網絡語言現象,剛性、靜態的治理措施往往失效甚至適得其反,彈性規制意味著治理標準本身能夠根據語言實踐的變化進行動態調整,為創新性表達預留制度空間。參與式治理原則倡導用戶、平臺、學界等多方主體共同參與語言治理過程,傳統的『自上而下』治理模式難以應對網絡語言的複雜生



態,而參與式治理則通過建立對話機制,將『用戶狂歡』的創造性力量轉化為治理優化的資源而非挑戰。

實際上,現有平臺治理實踐已為此構思提供了經驗支撐。2024年11月起,中央網信辦等四部門^⑫啟動『清朗·網絡平臺算法典型問題治理』專項行動,明確要求重點平臺構建『信息繭房』防範機制、提升推送內容多樣性豐富性、嚴禁推送高度同質化內容誘導用戶沈迷。同時,馬若宏等學者^⑬指出,網絡空間新興語言的動態出現是對既有語言規範的衝擊與補充,其治理應遵循『多元參與、立體監督、技術創新及借鑒交流』等係統維度。也有研究發現,在B站,青年用戶的算法身份建構遊移於『有意識』與『無意識』之間,用戶在順應平臺規訓的同時仍保留一定主動建構能力^⑭。一方面,平臺設立剛性底線,例如對死亡、病痛或災難進行娛樂化惡搞的行為被明確禁止,對基於性別等立場宣泄群體仇恨的言論予以嚴格處置。另一方面,B站在遊戲區引戰問題治理中明確提出從『人』和『事』兩個方向入手,區分『以偏概全的負面評價』與『基於事實的客觀批評』,後者明確不被禁止。這種『區分惡意行為與正常討論』的思路,本質上是在多元表達與社區秩序之間尋求邊界。平臺風紀委員會機制則使用戶以『眾裁』方式參與社區治理,將語言實踐的判斷權部分交還多元主體,為『狂歡兼容性』的落地提供了制度範本。總言之,『狂歡兼容性』的參與式治理核心在於『從過去依賴技術的透明式治理走向發揮人類力量的參與式治理』,重塑用戶在被算法規訓過程中的主體性^⑮。

(三) 算法倫理治理重構

1. 算法设计中的价值嵌入与多元考量

徐延民^⑯指出,『算法技術離不開社會空間中諸要素的參與,其社會倫理意蘊為算法生態空間的營造提供了沃土,對防範算法技術設計與運用中帶來的綜合風險具有重大意義。』實現『狂歡兼容性』首先需要在算法設計層面進行倫理重構。當前主流推薦算法多基於『用戶參與度最大化』的單維目標,這往往導致內容同質化和流行語過度繁殖。重構的算法倫理應納入更豐富的價值維度,包括多樣性指標的引入,使算法不僅推薦流行內容,也主動曝光小眾、新興的語言表達形式。語境敏感性的提升,使算法能夠識別語言使用的具體情境,而非僅依賴詞匯本身的表面含義。例如,『絕絕子』在不同社群、不同語境下可能承載截然不同的情感色彩和語義內涵,簡單的關鍵詞過濾或推廣都會造成誤判。透明性與可解釋性的增強,使用戶能夠理解算法如何影響其語言環境的形成。這包括提供『為什麼推薦此內容』的簡要說明,以及允許用戶在一定程度上自定義內容推薦邏輯。

2. 算法伦理治理框架建构

『狂歡兼容性』在治理框架上體現為從『清單式管理』向『原則性引導』的轉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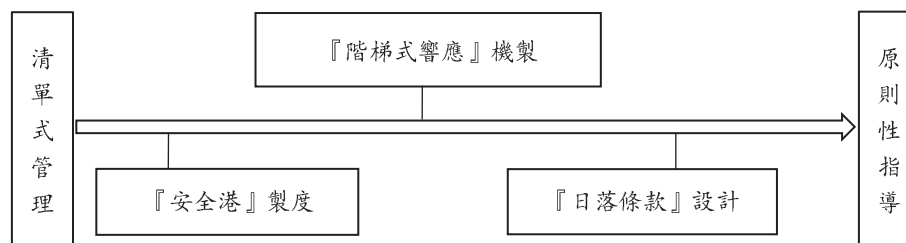


圖 5 『狂歡兼容性』治理框架运作机制

基於此,建立『安全港』制度是為實驗性、創造性的語言實踐提供容錯空間。例如,可設立語言創新實驗區,在特定平臺或社群中允許更寬松的語言規範,觀察其發展軌跡後再決定是否納入更廣泛的治理考量。同時,採用『階梯式響應』機制,根據語言實踐的社會影響程度采取差異化治理措施。對於可能造成實質傷害的表達,採取果斷乾預;而對於僅屬『品味』或『風格』範疇的非常規表達,則保持克制與觀察。而引入『日



落條款』設計,使某些語言管理措施具有時效性而非永久性。這既能應對特定時期的突出問題,又避免過時規則長期抑制語言生態的自然演化。

五、結論

網絡語言治理的核心倫理困境,是如何在秩序與自由、規範與創新、安全與活力之間找到動態平衡。『狂歡兼容性』提供了走出這一困境的可能路徑:它要求我們不再將『規訓』與『狂歡』視為對立的兩極,而是視為語言生態中相互塑造、彼此需要的共生力量。

未來網絡語言的健康生態,不應該是算法全面規訓下的同質化空間,也不應該是完全放任自發的無序廣場,而應是一個規訓與狂歡持續對話、相互調適的第三空間。在這一空間中,算法倫理的重點從『控制什麼被表達』轉向『如何培育豐富的表達可能』;語言治理的目標從『消除混亂』轉向『管理混亂的創造性潛力』。

最終,在生成式 AI 持續重塑語言生產的背景下,『狂歡兼容性』治理不僅是語言生態的維護,更是數字時代人文價值與技術理性的平衡路徑。

參考文獻

- ① Ananny, M. (2016). Toward an ethics of algorithms: Convening, observation, probability, and Timeliness. *Science, Technology & Human Values*: 41(1), 93–117.
- ② CHEN Jiachen. (2025). Internet mem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bodied cognition.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5(4), 235–243.
- ③ Chen, M. (2024). *Research on the trend of concealment and mildness of discipline*. Atlantis Press: 1669–1676.
- ④ Foucault, M. (1995).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⑤ Mittelstadt, B. D. & Allo, P. & Taddeo, M., et al. (2016). The ethics of algorithms: Mapping the debate. *Big Data & Society*: 3(2), 1–21.
- ⑥ WANG Yuhan & ZHAO Hanxuan & LIU Shaolong. (2025). A study on human-machine translation efficiency of Chinese chunk expressions driven by multi-dimensional prompts in large language models.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 124–134.
- ⑦ SHEN Yue, ZHAO Zhenqiang & LIU Shaolong. (2025). Research on English explicitness of implicit agent in Chinese chunks from perspective of spatial condensation.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5(2), 118–123.
- ⑧ 巴赫金(著),劉虎(譯):《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0年版。
- ⑨ 鄧伯軍:《認知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邏輯批判》,《馬克思主義研究》,2025年第12期,頁134–147+149。
- ⑩ 丁煌,廖臻:《數字學生賦能跨域公共治理:生成邏輯、實踐張力與未來圖景》,《電子政務》,頁1–9。
- ⑪ 杜駿飛:《數字交往論(2):元宇宙,分身與認識論》,《新聞界》,2022年第1期,頁64–75。
- ⑫ 方小兵:《數智時代的語言安全》,《中國海洋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6年第2期,頁153–162。
- ⑬ 方艷,譚相格:《技術善治視角下的網絡語言倫理建構》,《湖北第二師範學院學報》,2024年第1期,頁1–7。
- ⑭ 郭婉悅:《『xx子』的意義及演變探析》,《漢字文化》,2023年第10期,頁112–114。
- ⑮ 洪傑文,常靜宜:《『有意』『無意』之間:B站青年的算法身份建構研究》,《新聞記者》,2023年第12期,頁39–52。
- ⑯ 胡春陽:《網絡:自由及其想象——以巴赫金狂歡理論為視角》,《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1期,頁115–121。
- ⑰ 胡凌:《數字社會權力的來源:評分、算法與規範的再生產》,《交大法學》,2019年第1期,頁21–34。
- ⑱ 胡明鑫:《抖音算法知識視頻的生產、表演與規訓》,《未來傳播》,2024年第1期,頁40–48。
- ⑲ 黃文傑,劉清生:《由透明到參與:人工智能信任的法律建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2024年第5期,頁97–109。



- ⑳ 李祺瑤,金瑤:《中小學出招讓孩子『好好說話』》,《北京日報》,2025-11-03 (006)。
- ㉑ 李偉鑫:《被預置的確定性:智能算法的預測邏輯與『未來的鎖定』》,《學習與實踐》,2025 年第 12 期,頁 80-86。
- ㉒ 梁江霞,萬香花:《巴赫金狂歡化理論視域下的〈生死疲勞〉》,《今古文創》,2025 年第 48 期,頁 7-9。
- ㉓ 廖聲武,任祎曼:《論智能時代的算法倫理困境及其治理路徑選擇——基於羅爾斯正義論視角》,《新媒體與社會》,2024 年第 4 期,頁 1-12+412。
- ㉔ 劉寧:《『絕絕子』到『紙短情長』:網絡流行語在紙質媒介中的跨介質傳播》,《中華紙業》,2025 年第 8 期,頁 136-138。
- ㉕ 劉鵬飛:《肖莎娜·祖博夫的監控資本主義理論及其批判性審思》,《北方論叢》,2024 年第 1 期,頁 39-46。
- ㉖ 劉永謀:《現代人的境遇與解放——福柯人學述評》,《哲學動態》,2010 年第 7 期。
- ㉗ 陸道夫:《狂歡理論與約翰·菲斯克的大眾文化研究》,《外國文學研究》,2002 年第 4 期,頁 21-170。
- ㉘ 羅坤瑾:《狂歡與規訓:社交媒體時代虛假新聞傳播及治理研究》,《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19 年第 2 期,頁 68-72。
- ㉙ 馬若宏,杜敏,楊焱:《新媒體語言治理的學術內涵、關鍵問題與實踐維度》,《河南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4 年第 5 期,頁 1-7+21。
- ㉚ 米歇爾·福柯(著),劉北成(譯):《規訓與懲罰》,北京:三聯書店,2019,頁 249。
- ㉛ 彭肇一,孫發友:《狂歡理論視閥下網絡表情符號的傳播與反思》,《新媒體與社會》,2019 年第 2 期,頁 36-47。
- ㉜ 汪振,常欽:《網絡造句:大眾文化的狂歡盛宴》,《中州學刊》,2014 年第 3 期,頁 93-96。
- ㉝ 王長瀟,位聰聰:《網絡視頻直播中的『全民狂歡』與理性表達的引導——基於巴赫金狂歡理論的闡述與思考》,《視聽》,2017 年第 11 期,頁 5-7。
- ㉞ 徐延民:《算法倫理的多維批判及其空間轉向》,《探索與爭鳴》,2023 年第 12 期,頁 127-134+195。
- ㉟ 燕道成,談閻霖:《狂歡理論視閥下網紅經濟與文化的作用機制》,《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19 年第 5 期,頁 134-139。
- ㊱ 楊嵐:《『知識—權力』與規訓社會——對福柯《規訓與懲罰》的解析》,《學理論》,2009 年第 5 期,頁 114-115。
- ㊲ 張妮娜,周藝培:《從工具到廣場:共享文檔『在線野聊』的社交狂歡與數字想象》,《當代傳播》,2024 年第 5 期,頁 88-92。
- ㊳ 張濤,王錚:《國內外算法治理研究的主題比較與發展趨勢》,《文獻與數據學報》,2024 年第 3 期,頁 3-16。
- ㊴ 張賢明,崔珊珊:《利益、觀念與權力:制度化的三重視角》,《理論探討》,2022 年第 4 期,頁 41-47。
- ㊵ 張一兵:《小事情和細節支配:資本主義規訓的微觀控制論——福柯〈規訓與懲罰〉解讀》,《東嶽論叢》,2015 年第 5 期,頁 5-11。
- ㊶ 張亦瑄:《『主理人』:青年群體對職業身份和勞動過程的重構》,《中國青年社會科學》,2025 年第 4 期,頁 88-98。
- ㊷ 中央網信辦,工業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國家市場監管總局:《關於開展『清朗·網絡平臺算法典型問題治理』專項行動的通告》,國家網信辦網站,2024 年 11 月 24 日。
- ㊸ 周媛媛:《大語言模型背景下中文互聯網用戶的語言變遷》,《數字技術與應用》,2025 年第 8 期,頁 33-35。

(Editors: LI Ruobing & Bonnie WANG)